

郝景盛



郝景盛(1903~1955)，字健君，河北正定人。植物学家、森林学家和林业教育家。北京大学生物系第一届毕业生，德国柏林大学自然科学院博士(1937)和德国爱北瓦林业专科大学林学博士(1938)。曾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教授，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并短期兼任所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总工程师和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林学会创始会员之一，并曾任副会长。早年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著有Synopsis of Chinese Populus(中国杨属植物志)，Synopsis of Chinese Salix(中国柳属植物志)，Synopsis of Chinese Sambucus(中国接骨木属植物志)等。后来主要从事林业教育和林业建设，著有Pflanzenge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den Kukunor-See und über das angrenzende Gebiet(青海及周边地区植物地理)、《中国林业建设》、《造林学》、《林学概论》、《中国木本植物属志》、《中国裸子植物志》、《森林万能论》、《怎样植树造林》等书，曾提出中国东北红松以人工更新为主、实行合理采伐的科学方案和山地农村走农林牧全面发展道路的早期规划。

一、家庭与教育

郝景盛1903年6月18日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正定县西柏棠村一个正在富裕起来的农民家庭，是比兄长小15岁的幼子，中间还有两位姐姐。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因为父亲听说取消科举以后，读书没有用了，就令其辍学务农。务农期间读了不少闲书，还向私塾老师学习了一手好算盘。郝景盛后来常说，务农年代感受最深的有三件事，一是滹沱河水不断侵蚀耕地(由于太行山森林砍伐殆尽，滹沱河在1960年代以后干枯见底)，二是种田工具太笨太慢，三是农作物受病虫侵害。他一直在田间劳动到17岁那年，忽然在地里得知父亲让自己的侄儿到县城去考高小，于是就扔下锄把，进城报考而且考取。父亲因而大怒，拒绝付给学费。叔父说，孩子能考上就不错，你不供我供，供养了一年，给了父亲一个台阶下。作为班上的大龄学生，郝景盛努力念书和跳班，不久就升入河北省立第七中学。1924年由校长王国光推荐到日本占领下的旅顺工科大学。为了寻求强国富民之路，他选学了造船。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因为参加反日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并驱逐出“境”，即武装递解到天津港上岸。

回到乡下，父亲不理解他被学校开除的原因，要他继续种地。不甘终老农村的郝景盛，同父亲艰苦谈判，要了50块大洋再到北京一试。结果考

取了北京大学和天津北洋大学。他决定进入1925年夏天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生物系。从此他靠教私立中学、为《华北日报》编科学副刊等，自己挣钱维持生活，经济上不再依赖农村家庭。由于3个年级只有4个学生，生物系曾一度被停办。郝景盛暂时转入地质系，不久又回到重新恢复的生物系。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1929年郝景盛就在刘慎谔教授指引下到刚刚成立的北平研究院植实验室参与采集标本和分类学研究，接着在1930年参加中瑞(典)科学考察团，1931年参加中法西北考察团。1931年7月正式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是该系第一届三个毕业生之一¹。

二、学生时代参加西北考察

作为大学本科生的郝景盛，离开课堂参加中瑞和中法西北考察团。这对于他的早期科学研究有很大影响。因此在这里略做介绍。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多次到中国西部考察。1926年他在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资助下再次来到中国时，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单方面地为所欲为，而必须同与他受过类似教育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受到这些知识分子影响的中国政府打交道。经过谈判，组织了中瑞西北考察团。历时6年(1927 – 1933)的考察工作相当成功。考察团的大夫、斯文赫定的挚友胡迈尔(David Hummel)希望独立进行一次动植物标本采集，选定与考察团大队不同的东部路线。考察团的中国理事会决定派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学生郝景盛与胡迈尔同行。

1930年3月22日郝景盛、胡迈尔和翻译勃克坎普(M. Bökekamp)离开北平，由天津乘船从上海溯长江而上，于4月14日到达重庆巴县。在巴县又吸收了两位大学生助手，开始采集标本。在这里郝景盛结识了时任峡防局军事股主任的卢子英。卢子英是四川进步人士、民生轮船公司创始人卢作孚的胞弟，曾在黄埔军校学习。两位热血青年一拍即合，相谈甚契。4月27日起考察组沿嘉陵江步行北上，卢子英曾亲自护送。考察组经白龙江和洮河，于6月2日进入甘肃南部，6月27日到达位于黄河支流洮河谷地的岷县。在岷县与主要采集昆虫标本的两位外国人分手。郝景盛同一位助手继续北上，于7月4日翻过海拔3000米的喇嘛山口，9日到达兰州。从兰州沿西宁河(湟水河)西行，于7月26日到达西宁。在西宁附近采集标本后，8月初骑骆驼继续西行，到达今湟源县境。然后大致沿现在的湟倒公路，即109国道的一部分，折向西南到达倒淌河。这一带是藏族聚居的地

¹另外两位是张凤瀛(1904 – 1969)和石原皋(1905 – 1987)。张凤瀛是棘皮动物专家，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的创办者之一。石原皋出身皖南富家，曾从事药物研究和生产；抗日战争时期向新四军供应药品并最终成为共产党人，1949年参加策划了芜湖国民党军队起义；著有《闲话胡适》一书。

区。他们大致沿今214国道继续西南行，于8月20日到达现在属于共和县的东巴地区，在青海湖南部和阿尼玛卿山以北野营并采集标本，包括考察了海拔5168米的一座峰顶。然后北上到青海湖滨，再折向东南。9月初在源出阿尼玛卿山主峰的一条河谷采集。9月底回到西宁，10月11日从兰州坐牛皮筏沿黄河顺流而下，经过包头于11月7日回到北平。

这次首尾共计240天的考察旅行，采集了大量标本，积累了许多笔记资料，为郝景盛此后的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研究打下基础，也为他几年以后的博士论文准备了素材。在郝景盛以后确定的植物新种中，至少有8个以*kokonorica*(青海)做为种名。

相对于中瑞西北考察团，中法西北考察团很难说是一次成功的合作。由雪铁龙汽车公司资助的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这次考察，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提出派人参加。然而，法方从一开始就以殖民主义者的态度对待中方成员。1931年5月自北平开车时，不挂中国旗；途中在饮食生活方面对中国团员歧视。郝景盛在内蒙沙漠中受到法方团员卜安无理侮辱。中方团长褚民谊不敢抗议，郝景盛批评褚民谊是“汉奸”²，与北平记者周宝韩³一起宣布退出考察团。他俩在严寒的沙漠中奔跑一天一夜，才脱离险境，经包头返回北平，并在北平报纸上揭露了法方行径。当时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参加考察团的杨钟健(1955年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和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在1932年撰写的《西北的剖面》一书中说：“自北平出发，至迪化(今乌鲁木齐) 中法双方分手为止，几乎无一重要地方不发生纠纷，亦无一日不在双方暗斗之中。”法方头目哈特在归途中病死香港，打人凶手卜安回欧洲后自杀。郝景盛在19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会议上，还对这件事做过揭露。

三、植物分类学研究

1931年7月由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郝景盛正式到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任助理员。1932年郝景盛由北平研究院派到河北南部、山东、河南和陕西采集植物标本。

郝景盛这一时期的研究领域是植物分类学。他的兴趣集中在木本植物。除了发表若干新种外，他还系统研究了中国的杨属、柳属、接骨木属植物，完成了有关的科、属志。杨属植物的研究主要是系统概括了前人采集的标本和描述，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柳属植物的研究则更多基于自己

²褚民谊(1884–1946)，国民党元老，曾在法国里昂任中法大学副校长，后来投降日本，在汪精卫伪政权中任要职，1946年以汉奸罪被处决。

³周宝韩(1903–1972)，1929年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南川民主进步人士，抗日战争时期民盟重庆支部委员，1949年随第二野战军返回四川。

采集的标本，确定了许多新种和亚种。据不完全统计，由郝景盛确定拉丁名称的柳属植物名目不下35种。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柳属研究者，不断引用和确认郝景盛的研究成果。

郝景盛的植物分类学功底不限于木本植物，还涉及草本植物。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远郊躲避日本空袭时，他向两个儿子“吹牛”说，只要我不认识的植物，就一定是新种。有一回次子松林拿了一棵小草给他看，他说这是铜锤玉带草的一个亚种，可以命名为松林玉带草。虽然他从来没有发表这个“新”亚种，孩子们却一直记得这件事。

郝景盛关于中国木本植物、特别是裸子植物的研究工作，一直继续到抗日战争时期出版《中国木本植物属志》和《中国裸子植物志》。

四、留学德国期间转向林学

1933年，郝景盛考取河北省公费留美，后改去德国。同年他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的赵为楣女士结婚。他们的介绍人是北京大学同班同学石原皋。富裕家庭出身的石原皋早在1929年就在印有水墨山石和“石不能言最可人”背景的私人信签上留下字据：“保证郝景盛与赵为楣必能两相契合、结为夫妻；如若不然，唯我石头是问”。郝景盛在1934年春告别已经怀孕的妻子独自到达德国柏林。他先后入柏林大学理学院和爱北瓦林业专科学校(Frostlische Hochschule Eberswalde)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的长子在北京出生后，取名柏林；一词双关，即是德国首都，又是常青树木。1935年初夏，赵为楣携襁褓中的幼子到达柏林。后来诞生在柏林的次子不得不取名松林，抗日战争时期出生在四川的两个女儿取名杉林和杆林，都是常青乔木。

郝景盛在柏林大学研究植物地理和植物生理，并以气候学为副专业，1937年以论文《青海及周边地区植物地理研究》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8年6月在爱北瓦林业专科学校获林学博士学位，是该校百年历史中所授予的第21位博士，也是获此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的博士论文《用生物化学方法断定林木种子发芽率之研究》所建议的手段，能在30分钟之内判断种子是否发芽，回答过去涉旬月才能解决的问题，后来德国、波兰等都曾采用此种方法。郝景盛还利用柏林植物园丰富的标本收藏，继续从事一些植物分类学工作。取得博士学位以后，郝景盛曾短期在普鲁士林业局任技师。

1937年卢沟桥抗战爆发之后，中德两国虽然保持着外交关系，但欧洲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中国留欧学人，纷纷考虑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北平已经沦陷，北平研究院不知迁往何方。那时的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曾

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实业部次长。他倡办教育、提携青年，当时有“北蔡(元培)南马”之誉。郝景盛慕名致信马君武，请求指点出路。马先生与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谈好后很快复信，邀请他到广西工作。心中有底之后，郝景盛夫妇便携两幼子经香港和越南海防、河内，于1939年2月辗转到达昆明。

五、林业教育与著述时期

原来准备在昆明稍事停留，就转赴广西。但很快得知，北平研究院院部和许多研究所已经撤退到昆明，于是郝景盛又回到了暂设在昆明市远郊黑龙潭的植物研究所。虽然没有去广西，郝景盛终生对马君武先生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

部分由于工资太低，更多地出于对造林事业的热爱，郝景盛同时在云南省建设厅林务处兼任副处长和技正，开展造林工作。为了解决战争物资需要，他曾尝试在云南种植橡胶，虽然做到少量割胶，终于未能实现大规模生产。当时林务处长是一个只拿钱不做事的小官僚，具体工作都要由郝景盛支撑。林场工人领不到工资，郝景盛曾拿自己的薪水周济。

郝景盛1940年到重庆参加全国生产会议，在林业组结识了林学界前辈梁希⁴先生。梁希对这位热衷于森林事业的年轻人颇为赏识，随即推荐郝景盛到重庆中央大学森林系任教授。于是郝携全家由昆明乘卡车北上，经贵州一角，到达四川泸州，再顺江到达重庆沙坪坝。最初一家四口挤住在单身教师宿舍的一间小室，后来在嘉陵江边的山坡上租住了一间草房。郝景盛在中央大学讲授造林学、树木学、森林立地学等课程。他编写的《造林学》，是中央大学丛书的一册，到1952年出到第四版，1950年代还曾在台湾印行。郝景盛于1941年夏秋同几位中央大学教授组织西北考察团，到川北、甘南、洮河上游一带考察，并且观察了9月21日日全蚀期间的生物行为。

旧中国农林学界派系严重，性格耿直而又与派系无关的郝景盛虽然受到梁希重视，终难稳定立足。1943年夏他带领学生到重庆北碚实习时，向1931年结识的老朋友时任北培设治局长的卢子英叙述了自己的苦衷。卢子英立即邀请郝景盛住到北碚来指导造林，并为郝家在李庄租住了一处小楼。郝景盛经常到北碚各乡场指导种树，在《嘉陵江日报》上写文章鼓吹植树造林。不久又应北平研究院李书华副院长之邀，担任了昆明北平研究

⁴梁希(1883–1958)，中国林业和森林化工的前辈，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会员，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林业部)部长，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

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和所长⁵。其实当时研究所的规模不及后来的一个研究组，最贵重的设备是几台显微镜，分散保存在同事家中，以免全毁于日本轰炸。郝景盛曾数度飞往昆明工作，但主要时间在北碚安心著述。这一时期成为他写书最多的年代。《中国林业建设》、《森林万能论》、《中国木本植物属志》、《林学概论》、《中国裸子植物志》等书都是在北碚定稿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郝景盛一家并没有立即返回北方。他要谋求一份能够发挥林学专长的工作，要托亲友在北平先买一处小四合院做长远安身之计，还要等待长子柏林小学毕业。一心向往东北森林的郝景盛最终接受了东北大学聘请，出任森林系教授并兼农学院院长。1946年夏，他把柏林留在北平上中学，携全家到沈阳东北大学赴任。他在校务会议上多次因教学理念和学校管理与校长冲突，1947年又因保护进步学生与校长意见不合。东北大学逃离沈阳到达北平之即，校长未按惯例事先打个“请另谋高就”的招呼，就把郝景盛解聘。他失业3个月。1947年底又回到老单位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

六、为新中国森林事业奋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郝景盛在植物研究所内成立森林植物组，多次参加森林调查(察北绥东森林调查、永定河中下游地区调查、冀西沙荒造林调查等)，并兼任山西省林业顾问。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部长梁希先生念念不忘这位林业干将，同中国科学院商调郝景盛。1954年10月，郝景盛正式调任林业部总工程师、技术委员会主任，并参加筹组中国林业代表团，准备出席世界林业会议。在解放后的短短几年中，郝景盛得以施展抱负。这是他为人民贡献知识和才华的最愉快时期。

郝景盛提出了东北红松以人工更新为主，实行合理采伐的科学方案。东北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林区曾是我国丰富的木材宝库。由于长期实行大面积采伐，严重威胁这一宝库的生存。郝景盛在1951和1953年两次应东北森林工业总局的邀请，率领人员深入小兴安岭林区，搜集了森林生长与采伐的历史资料，实地考察了红松生长、结实和更新的情况，以及天然更新过程中针叶密林转化为桦杨和针叶混生林，再退化为榛柴林、小叶椴和灌木丛，终于成为草坡、泥地和裸岩的过程。根据红松结实的树龄和数量，天然和人工萌发率的实际数据，参考德国和朝鲜的营林经验，郝景盛明确

⁵2008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高等教育出版社)没有提及郝景盛曾任所长。这里是根据李书华1944年5月30日为其主编的《科学概论》所写序言第1页“生物篇由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郝景盛先生担任”；1950年代初期思想改造运动中郝景盛“自我检查”中也提到当年李书华把“代所长”改为“所长”后才接受聘书。

提出：“以人工更新为主，天然更新为辅，小面积采伐作业，采造并举，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经营方针，要求随采伐随更新，并逐渐对老采伐迹地进行更新，“不欠新账，还清老账”。他同时指出森林火灾对红松林的特别威胁，提出了预防措施。当时苏联专家提出“长白山林区施业案”时，郝景盛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经营观点，受到与会者支持，对“施业案”进行了修改。郝景盛总结这一时期科学成果的《东北红松生长及更新方法的研究》一文，1952年发表在《中国林业》第6期上；1953年又完成《红松林的经营法则》一书(未正式出版)。

七、山区农村走农林牧全面发展道路的早期规划者

1953年，郝景盛受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委托，到平顺县西沟村、羊井底村和榆社县南村，先后住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和武侯梨家中，白天一起上山逐坡逐田调查，晚上共同商议山区发展规划。他一身农村老汉装束，头戴毡帽，用布条子系着肥大的裤腰。他通过和老乡们谈天，对耕地、牧草地、宜林地、荒山、石山、河滩、树林、对牲畜种类、头数，男女劳动力数、粮食产量、副业情况和人均所得，对村中现有果树品种、等待结果年限、逐年产量、销地和售价等，进行了仔细调查。同时对林木、果树、牧草、蜜源植物、河谷、池塘、山坡、土壤、石头等自然资源条件做了全面了解和必要的实验研究。1953年4月15日郝景盛在山西省人民政府行政会议发言时指出：“各地农民，多知道耕地、开垦种庄稼，对于林木不大注意。每到一村，我们若问村中老农有多少耕地，他可以马上回答亩数。若问荒山或牧草地有多么大，则摆头摆手表示不知道。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农村居民向来没有想到荒山、草地、石头砬子也能生产东西。这些地方如果利用得当，它的产品价值并不在农田之下”。

在同农民“算细账、算长账”的基础上，结合农民眼前利益，郝景盛协助西沟村李顺达和申纪兰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和羊井底村武侯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制定出近期和长远的农林牧全面生产计划。这样的规划，不仅有具体可靠的数字，还编成了便于理解、记忆的顺口溜：“高山远山森林山，低山近山花果山、缓坡梯田环山转，平川都是米粮川。兴水利，修水池，蓄水灌溉好浇园，……”。这样的规划，在写到纸上之前，已经印进农民心里。连原来认为“不管上面来多少干部做计划，山上的石头也变不成小米”的人，也觉得“石头能变小米”了。

平顺县羊井底村坚持实行农林牧全面发展十年，取得显著成绩。1964年《人民日报》记者冯东书和李玉秀进山采访，写了题为《重新安排这里的山河》的长篇报道，说农民们至今还清楚记得林业部的专家郝景盛的宏亮

声音：“山是摇钱树，要向山要钱”。但“耕地面积原则上不宜再扩大，开地越多人越穷，因为违反了自然法则。”（1953年3月在山西省长治专区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八、主张靠造林根治河流，消除天灾

郝景盛年轻时曾经踏勘过黄河源附近地区，此后多年一直留心有关黄河的资料，写过许多篇论述造林与治河、森林与水旱灾害关系的文章。1953年在讨论三门峡水利建设工程时，刚刚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清澈见底的大河上建设过水电站的苏联专家力主建设黄河大坝，郝景盛在会议上发言指出，黄河中上游地区必须搞好水土保持，否则三门峡水库将会变成“沙库”。1954年，中国科学院为配合三门峡工程，组织黄河中游考察队，郝景盛任队长。临行前检查身体发现病患，未能成行，但在病中仍一直关心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事实上三门峡水库在建设过程中即出现严重的泥沙淤积，半个多世纪以来多次为排沙清淤增建管路，改变水库运行方式，大坝存废之争延续至今。

郝景盛在《森林万能论》一书“森林是水旱灾之制裁者”一节中，记述1930年重庆长江最高和最低水位差为30英尺(约9.1米)，而1940年代中期达100英尺(约30.5米)，其原因在于上流森林遭到大量砍伐。他指出“长此下去，谁也不能担保，来日之长江不成今日之黄河；长江下游水患之期，为时恐不远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内蒙和华北地区的几次雹灾，促使郝景盛搜集有关数据资料。他从分析雷雨冰雹的成因、树木对水份的吸收和蒸发、森林对上升气流的影响等多种因素中得出森林基本上能消灭冰雹的结论。研究论文因为国内某著名气象学者的反对而未能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在关于论文的一次争论中，那位气象学家指出：冰雹分三种，森林不能消灭海洋冰雹。郝景盛立即反驳说：“什么时候你到海洋上种庄稼，我就去消灭海洋冰雹。”当时担任着山西省林业顾问的郝景盛曾向省长裴丽生⁶介绍争论情况。裴丽生说，我不懂这件事科学上的是非，但你的提法有利于鼓励农民种树，指示山西省林业干部训练班印成单行本散发。这本小册子对促进植树造林起了积极作用。

⁶裴丽生(1906—2000)，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省长，1956年调到中国科学院，曾任秘书长、副院长，是中国科学院领导班子中深受大家爱戴的“一夫三生”(张劲夫、杜润生、秦力生、裴丽生)之一。

九、林业的热情宣传者和 诲人不倦的林学教育家

郝景盛在从事林业教育的同时，挥笔著文，大声疾呼，以期唤起人们对造林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自1939年回国后的8年间，他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宣传造林和森林利用的文章50多篇。在旅居北碚期间，他曾为《嘉陵江日报》撰写多篇关于植树造林的宣传报道，并到四乡指导种树，促进了这一风景区的林业建设。在此期间，他以《森林万能论》为书题，陈述森林与木材对国家之重要性。对于“万能”一词，直至1980年代国内仍有学者持有异议，鼓吹“重新估价森林的作用”，并在学术报告中说“《森林万能论》的阴魂至今不散”。然而，随着环境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于森林的多种效益已经有了新的评价。人们对森林重要性的认识和郝景盛著书的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用“万能”喻森林效益之多是否过分？作为一种振聋发聩的呐喊，见仁见智，可以留待历史评说。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郝景盛“自我批评”说：“我幻想着通过自己写的森林书籍和文章对社会能发生进步作用。我写书不只为个人出名和稿费的收入。我主要想着推动中国林业向前发展，因为我看到中国的荒山最多，总觉得这是应当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唯一的办法即是写几本书，呐喊呐喊，以便引起国人的注意。以往是如此看法，现在还是这样看法，将来在水旱风沙冰雹灾害未减少之前，我还是不能变更我的看法。”他对发展中国林业的热忱和执著的追求溢于言表。

郝景盛多年从事林业教育，曾执教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京林学院和林业部林业干部学校。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热情鼓励，同不少青年结成忘年之交。许多受过郝景盛教导的青年，后来成为我国林业科研、教育和生产的骨干。郝景盛多次对他的学生们讲：“你是学林的，必须深入林区、深入山区调查研究，因为林学本身就是一门生产实践的应用科学；我国林业比较落后，希望你们不仅成为林业科技工作者，而且还要成为林业科普工作者，这样才能符合社会的需要。”郝景盛为宣传林业、普及林业知识，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多种场合下都不失时机地向各阶层人士进行宣传，大讲森林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和振兴林业的迫切性。或写文章、或做报告、或与人促膝谈心，郝景盛都能结合实际、切中要害，既有条理清楚、富于哲理的科学论说，也有通俗易懂，群众乐于接受的顺口溜。如1950年代在山西贫穷山区提出的口号：“山区要想富，发展农林牧”；“抓住光水土，自然不受苦”。这两句口号既明确指出了发展方向，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科学原则。1950年，察北绥东森林调查团在张家口进行总结，原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决定省、市机关干部停止办公一天，请郝景盛做报告。报告会后大家普遍反映，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好

的专家报告，林业的作用太大了。

1954年9月，郝景盛因病未能率队考察黄河，但身在北京，心在黄河。他到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收集和查阅大量有关黄河的资料，准备提供给黄河考察队。这时，郝景盛病情加重，但他仍然决定去山西。组织上劝他不要去，他说：“一批青年在那里等着我，他们需要我，我不能不去。”就这样郝景盛到了山西，准备率领植物所和山西省林业局的一批青年人去管涔山林区研究云杉生长过程。在由太原转车到达宁武车站之后，郝景盛开始发烧。由于没有医院，临时请附近一所畜牧兽医学校的校长带校医前来看病。恰恰这位校长曾是1950年察北绥东森林调查团的成员，深知郝景盛的为人，抓紧机会请郝先生为全校师生做报告。郝景盛在打针吃药后，立即到校做了两个多小时热情洋溢的报告。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对青年讲话。第二天，全体人员牵着5头骆驼向林区进发，60里山路走了14个小时，到达管涔山森林经营局驻地—东寨。这时郝景盛的病情愈益严重，组织决定由陈介(后来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护送回北京，立即住院。1955年4月25日，这位毕生为中国林业奋斗的科学工作者，终因肾癌逝世，年仅52岁，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郝景盛从事林业科技工作20年，著作之多，范围之广，堪称当时林业界的榜首。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是他的学术思想；深入林区、基层，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是他的工作方法；和群众打成一片，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他的工作作风；不怕困难，勇于创新是他的献身精神。他将国外先进的林业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经过调查研究和自己的实践，编写出的《造林学》一书，具有理论上的先进性、技术上的实用性，成为当时国内第一部最新的造林学的专著和大学教材，对推动中国造林技术水平的提高与发展有很大作用。他提出的“以人工更新为主，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经营方针，对东北林区的开发利用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他提出山区建设要统一规划、合理使用土地，农林牧全面发展的理论，至今仍有它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十、郝景盛主要论著

K. S. Hao, 1931, Synopsis des linum Chinois, *Contributions from the Laboratory of Botany, Natioanl Acad. Peiping*, **1**: 89 – 91.

Hao Kin-Shen, 1933, Synopsis of Chinese Sambucus, *Contributions from the Institute of Botany, National Academy of Peiping*, **2**(1): 21 – 29.

K. S. Hao, 1934, Plantae novae Sinicae, I. Repertorium Specierum Novarum Regni Vegetabilis (Fedde Reports), **XXXVI**: 222 – 224.

- K. S. Hao, 1935, Synopsis of Chinese *Populus*, *Contributions from the Institute of Botany*, National Academy of Peiping, **3**(5): 221 – 241.
- K. S. Hao, 1936, Plantae novae Sinicae, II. Repertorium Specierum Novarum Regni Vegetabilis (Fedde Reports), **XL**: 213 – 215.
- K. S. Hao, 1936, Synopsis of Chinese *Salix* with 88 figures and 44 plates, Repertorium Specierum Novarum Regni Vegetabilis Beihefte, **93**: 1 – 123.
- K. S. Hao, 1937, Plantae novae Sinicae, III. Repertorium Specierum Novarum Regni Vegetabilis (Fedde Reports), **XLII**: 83 – 86.
- K. S. Hao, 1938, Pflanzenge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den Kukunor-See und über das angrenzende Gebiet, Botanische Jahrbücher, **LXVIII**(5): 515 – 668.
- Kin-Shen Hao, 1939, Über Saatgutprüfung auf biochemischem Wege, Zeitschrift für Forst- und Jagdwesen, **71**(3, 4, 5): 141 – 156, 187 – 204, 249 – 269.
- 郝景盛, 1942, 甘肃西南之森林, 地理学报, 第9期: 48 – 66.
- 郝景盛, 1944, 造林学, 重庆: 商务印书馆; 第4版,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2。
- 郝景盛, 1945, 科学概论生物学篇, 李书华主编《科学概论》, 重庆: 商务印书馆; 第2版,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6。
- 郝景盛, 1945, 中国木本植物属志, 上册, 重庆: 中华书局。
- 郝景盛, 1945, 中国裸子植物志, 重庆: 正中书局; 上海: 正中书局, 1947;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1。
- 郝景盛, 1946, 林学概论, 上海: 商务印书馆;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 郝景盛, 1947, 森林万能论, 上海: 正中书局。
- 郝景盛, 1950, 察北绥东森林调查团的总结, 中国林业, 5: 27 – 34.
- 郝景盛, 1950, 关于永定河上游的造林问题, 中国林业, 6: 11 – 12.
- 郝景盛, 1952, 东北红松生长更新方法的研究, 中国林业, 6: 23 – 31.
- 郝景盛, 1954, 怎样提高木材生产,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丙种专刊第3号, 中国科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 冯东书、李玉秀, 1964, 重新安排这里的山河—羊井底村第一个十年规划的成就与经验, 《人民日报》, 7月26日。
- 宋朝枢, 1982, 怀念著名林学家郝景盛, 《中国林业》, 第4期: 17 – 18.
- Fang Chen-Fu, Alexei K. Skvortsov, 1998, Validation of Hao's new Chinese taxa in *Salix*, *Novon*, **8**: 467 – 470.
- 徐凤先, 2007, 郝景盛在西北考察团的植物采集及后来的研究, 《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26卷 增刊, 2007年5月, 23 – 30.

李萱华，2010, 森林之父郝景盛汗洒北碚遍山绿，李萱华著《小陪都传奇—抗战北碚的文化大气象》第24章，北京：作家出版社，336－348.

撰写者

郝柏林(1934-)，复旦大学教授，郝景盛长子